

定性资料的收集和应用

——介绍典型组专题讨论的调查方法

解振明 姜彬彬

【提要】人口学研究,不仅要重视收集定量数据,而且也应重视收集定性资料。以往的定量调查囿于问卷封闭式的提问及在固定答案中作圈填式的选择,研究者难以推导出导致某种选择的原因。典型组专题讨论,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其科学和严谨性贯穿于调查全过程。该方法的主要特点在于,通过“群体效应”,以获取所需的真实信息。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采用该方法对宁夏平罗县和广东四会县进行了一次定性调查,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妇女地位和基层计生情况,获得了大量的、生动的信息。

【作者】解振明 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人口室,主任、副研究员;姜彬彬 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人口室,助理研究员。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的形势下,中国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实践向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口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人口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上,需要更高层次、更深入的研究。这里所说的高层次人口学研究,主要是指对人口现象与非人口现象因果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人口发展目标和计划生育方案的对策研究^①。由于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因此对研究的数据和资料也提出更高的要求。研究者不仅应重视收集质量可靠的定量数据,而且也应重视收集内容翔实的定性资料,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者对中国人口国情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具体来说就是,不仅要知道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在反映人口现象及其变化的大量数据和资料中,一类是定量数据;另一类是非定量

数据,又称定性资料。所谓定量数据即数量化的信息,是指用数字或数值形式表示的数据。如某人口的总数、生育率,某个人的年龄、受教育年数等。而定性资料则是非数量化的信息。它们或者没有量化,或者是不能量化。如行为、态度、意见以及某些人口特征等。这些定性资料少则寥寥数语,多则洋洋万言,描述和反映了人们的行为、态度和意见,无需量化便可为研究者应用。当然,一些定性资料也常常被量化,除了诸如个体的性别、婚姻状况等反映事实的定性资料,在统计分析中可以量化为名义变量外,有些反映个体行为、态度和意见的定性资料,也可以量化,但通常只作为分类级测度的次序变量。例如,某人的某种行为、态度和意见的强弱程度可以分为3级(同意、不置可否、不同意)和5级(完全同意、部分同意、不置可否、不同意、坚决反对),甚至于可将强弱程度分为7级或9级。由于一般人很难将强度

^① 魏津生:《现代人口学》(现代社会科学丛书),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32页。

等级准确区分为7级以上,所以很少设置7级和9级。这些量化后的定性资料不仅失去了原有的许多特点,而且由于测度水平较低不能参与某些高级统计分析,因而往往不被研究者重视。其实,那些不能量化或没有量化的定性资料往往正是研究者进行高层次研究时所必需的。因此,在人口调查中,我们不仅应重视对定量数据的收集和整理,而且应该注意对定性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一

中国人口学研究在过去十多年内获得了长足发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发展极大地受益于同期进行的各种人口调查。正是这些人口调查所提供的大量数据和资料,使得人口研究得以展开。80年代初,就在中国现代人口学研究拨乱反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进行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次普查为了人口研究提供了大量定量数据,使我们了解了中国人口的总体概貌。但是,从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我们知道了中国男女人口的比重,却无法得到育龄妇女人口的生育和节育的信息;有了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构成,却不知道更详细的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状况,如此等等。于是,各种各样专题抽样调查便应运而生。如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深入的生育力调查、老年人口调查、独生子女调查、流动人口调查等。这些专题抽样调查为中外人口学者了解和研究中国人口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填补了中国人口资料的许多空白。

然而,80年代在中国进行的绝大多数人口调查是以收集定量数据为目的的。这些定量调查通常采用个别访谈问卷式的调查方法,即一个调查员面对一个调查对象,一问一答,根据回答在问卷上圈填答案。也有的调查采用一个调查员面对一群调查对象,由调查员提问,调查对象各自圈填答案。大多数定量调查所提出的问题限于事实性问题,很少询问有关行为、态度和意见的问题,即

便有这样的问題,也采取封闭式提问,让调查对象在固定答案中进行单项选择或多项选择。而充分、深入、详细、具体的描述和反映人们行为、态度及意见的定性资料却很少受到关注,收集定性资料的调查方法也被冷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作为人口控制的重点地区,已经越来越受到人口研究者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关注,他们在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实际工作中发现了一些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问题。譬如,多孩生育主要发生在农村纯女户家庭,这是从大量定量调查获得的结论;而且有的调查还计算出更详细的结果,对不同地区的纯女户、不同收入的纯女户、不同文化教育的纯女户等多孩生育的情况作出估计。这无疑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分类指导有很大的帮助,为科学的决策提供了依据。但是,仅从定量调查获得的数据中,人们还不知道当前农民思想深处的想法,无法理解某些超生行为。如有的富裕农民为了多生一个孩子再多的罚款也不怕,而有的贫困户则宁可负债也要再生一个。正如许多农村计划生育基层干部所说:“富的不怕罚,穷的罚不怕”。我们常说要对这部分育龄人群加强思想教育,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也不理解他们,又怎样去教育他们,又何以能改变他们呢。

又譬如,当前中国农民在生育上的性别偏好还相当强烈。有的调查将农民想生男孩的原因概括起来列在问卷上,如为了传种接代、养儿防老、缺少劳动力、怕受人欺侮等等。其实这几种原因在实际生活中是互相关联着的,被检查者很难把自己的想法分解并归纳成为上述某种原因,只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调查员的要求从中圈填一项或几项。研究者虽然可以从调查结果获得各种原因的构成比,但却无法看到数字背后隐藏着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无法捕捉不同特征的人在

思想认识上的差异。而且,这种选择式问卷没有提供机会让被调查者回答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选择,研究者也无法从这一大堆数字中推导出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样的选择。况且有的定量调查由于调查设计的不科学或调查中的人为干扰,造成调查结果的误差和偏差较大,影响了这些定量数据的应用,甚至使一些定量研究无法进行。

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只有充分理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才能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更贴近客观实际,使我们提出的对策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人口研究中,除了重视对定量数据的应用外,还需要把定性资料结合到现有的定量研究之中。在收集定量数据的同时,对所需的定性资料进行认真的收集,重视开发和应用定性数据。

二

一种曾在国外市场调查中被广泛使用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即典型组专题讨论的调查方法,近年来在人口学的调查研究中得到应用。典型组专题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是把一个组(5~10人)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或共同经历的人召集在一起,对某个问题或若干个专题进行自由地座谈讨论。此调查方法包括五个核心部分:(1)讨论限于一定的专题范围内;(2)根据事先设计的讨论提纲展开讨论;(3)与会人员是从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或共同经历的目标人口中筛选出来的;(4)会议由训练有素的主持人、记录员和助手共同组织;(5)对全部发言进行录音和记录并制成文字材料以备分析研究使用。

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典型组专题讨论的调查方法都不同于通常使用的定量调查。首先,从调查的形式看,它不是个别访谈,而是一、两名主持人在记录员和助手的协助下同一小组被调查者坐在一起的讨论;它不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而是在主持人

引导下采用自由座谈的方式;它不用问卷,而使用讨论提纲,因此回收的不是调查问卷,而是记录本、录音磁带和抄录本等。其次,从调查的内容看,它不仅仅收集事实性的答案,主要是收集反映人们行为、态度和意见的信息。因此,对于所获得的调查结果,并不注重它在目标人口中的代表性,也不用来推导总体,而是充分、深入、详细、具体地反映被调查人群的想法和看法。

典型组专题讨论不是一种随意性的座谈讨论。此方法的科学和严谨之处在于对讨论提纲的设计、与会人员的筛选、会议次数的确定、会场地点的选择、会场的布置和气氛、会议主持的技巧和记录录音的整理等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所有这些规定和要求都是为了使与会者在讨论中畅所欲言,并能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形成“群体效应”,充分发表各自的意见,使调查人员获得所需的真实信息。座谈讨论中的记录本和录音磁带,以及事后整理出来的抄录本等便是调查获得的“数据”,它是负载着大量信息的文字资料,是非数量化的定性资料。定性资料也可建立起数据库,国外的研究者为此编制了计算机软件,可将定性资料按不同的专题或主题词(Key Words)进行分类储存和调用,供研究者分析时使用。因此,研究者不必亲自参加每次调查,可以利用别人调查的结果,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定性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重视定性资料的收集,并不是否定定量数据的调查和收集。定性资料不仅有助于研究者对定量数据更好地解释和分析,而且有助于定量调查的设计者更好地设计问卷,更有效地组织定量数据的收集。

三

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于1993年9月组成两个调查小组,分别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平罗县和广东省的四会县进行了一次性调查,采用的方法就是典型组专题讨论的调查方法。

该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妇女地位和基层计划生育情况，围绕研究目标设立了若干专题，如农村妇女在教育、就业、婚姻、家庭、生育、节育、养老等方面与男子有什么不同？如何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计划生育怎样同社区发展和家庭致富相结合？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农村育龄妇女，为此设计了6个女性人口典型组：未婚大龄女青年组、纯女户妇女组、婆婆组、女强人组、三资企业女工组和妇女干部组；此外还设计了几个相关的典型组，如村干部组、农村知识分子组、宗教人士组、在外务工丈夫组和基层计划生育专职干部组。在两县当地干部的协助下，共召开了22个座谈会，参加每个座谈会的人数均不超过10人。谢绝无关人员参加会议，以免干扰自由讨论。主持人、记录员及助手都置身于与会者之中，根据事先准备好的讨论提纲引导大家发言，会场的布置和气氛使与会者感到舒服没有压力。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谈到开心之处大家开怀大笑，说到伤心之处有的不禁落泪。有些与会人员表示，“本来不想说话的，但是看见大家无拘无束地说得火热，也就想说上几句”。每次座谈会控制在2个小时左右，除记录员做好笔记外，还用了两台录音机错开时间进行录音，会后立即将记录和录音整理在抄录本上。按照要求抄录本不仅记录与会者的全部发言，还简要记下当时会场的气氛和发言人的表情，研究者在阅读这些资料时，仿佛身临其境。

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对上述调查所获的定性资料进行了认真分析，对当前中国妇女地位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从总体上来说有了一定的提高，但部分中老年妇女的地位却相对地恶化”。报告大量直接引用了农村妇女的生动语言，描述了农村出现的某些新情况，如一些妇女说，“男的出去能搞钱，

妇女在家喂猪、喂牛、种田，不管是滴水（浇水）、施肥，这些男人干的活也学着干”。一位中年妇女：“我丈夫出去当瓦工，经常在外。我在家种8亩地，什么活都是我的，……从古到今摇耒都是男的，我们家都是我摇。……我一个人就当两个人使着呢。……我出去干，钱怎么拿不来？你想出去干个啥，（别人）就说你跟哪个男的勾搭呢！‘你这钱怎么捞得这么快？’纯粹是一种压力。……什么苦来都给妇女吃，男的连一半都不担。生孩子、人工流产、吃药、上环、结扎。苦头应该让男人吃一半才对着呢”。从这些简单朴素的语言，使我们看到，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仅仅为她们提供创收的条件还不够，还必需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

研究报告在解释当前有些农民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的原因时，改变了以往研究人员对各种原因的简单概括，而是大量引用与会人员的语言回答了农民心里想的问题。一位男村长说：“我们乡为什么养了女儿的要儿子？这是传统习惯。没有儿子别人要说你，当地有个土话叫‘焦尾巴’，谁不养儿子就是‘焦尾巴’，这辈子做坏事，连个儿子也没积下来。”纯女户妇女没有儿子更是感到自卑，她们纷纷说，“生不上男孩的妇女好象是下等一点”，“连个儿子也生不上，别人就看不起你嘛”。妇女们还举出一些例子，“去年向阳村的一个男的没儿子，别人跟他骂仗（吵架），说他绝了种，断了后了，一气给骂的气坏了，……就捞上锹给砍了”，“农村这种情况最气人了”。可见，除了生产和生活中需要男劳动力之外，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和习惯势力仍然禁锢着农民的生育观念。因此，在研究中国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现象时，对中国农村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习惯势力没有深刻的了解，就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惯势力对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

的影响将成为中国人口研究的重点。因此，定性数据的收集将越来越成为必要。

典型组专题讨论的调查不能象抽样调查那样获得定量数据，它获得的结果也不能用于推导总体。譬如与会者10人中有5个人同意某种观点，并不代表全体人口中50%的人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它在收集某特殊人群对某事物的看法、意见、建议时却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所获得的数据是对定量数据的补充和深化。如果要想对总体人口的情况作出描述和解释，则需要收集必要的定量数据，或者从原有的定量调查的结果中寻找，或者另组织一个定量调查去收集所需信息。在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调查组对平罗和四会两县进行定性调查的同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也在这两个县进行了旨在收集定量数据为目的的抽样调查。这两个调查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为有关部门提供基本情况，从而使这两个县把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自愿、优质的计划生育及妇幼保健服务结合在一起，使这些地区既可以达到人口控制目标，又能避免工作上的强迫命令，实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的计划生育既要抓紧又要抓好的要求。根据上述目标，两个调查按各自的特点，分别进行调查设计和实地调查。当然这两个调查由于同在一地进行，又是为了同一目的，因此可以采取联合调查的形式，但必须按照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的不同特点和要求，认真进行设计和实施。

典型组专题讨论的调查方法有一个不足之处，这就是调查结果容易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个主观性主要产生于会议的主持人。主持人根据调查提纲主持会议时，主要根据自己对调查提纲的理解去引导和启发与会者发言，在引导中很容易表露出某些主观的诱导，在启发中也可能会掺杂自己主观的认识。所以主持人的能力和责任心直接关系到

会议的质量。同时，记录员、录音员和助手也应各负其责，协助主持人共同组织好会议。因此，调查人员的培训便成为定性调查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在组织这次定性调查之前，请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学者赫尔（Terence Hull）教授为调查小组的全体成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此后，调查小组赴北京市郊区门头沟区永定乡进行了一周的试调查，旨在检验调查提纲，培训调查人员。调查小组的全体人员在理论培训中收集了国内外典型组专题调查各种实例的有关资料，多次组织讨论，不仅从理论上了解定性调查的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了解此项调查的目的。调查小组的成员在试调查中轮流担任主持人、记录员、录音员和助手，不仅熟悉了调查方法，而且对农村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所有这些前期准备，确保了实地调查的顺利进行，并有效地减少了对调查结果的主观影响。

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在收集定性资料所进行的实践，为在中国人口调查中引入定性资料的收集方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们在总结此项调查的经验和体会时，又一次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反对本本主义》等论著，认为毛泽东在50年前就非常重视定性资料的收集，毛泽东当年所进行的大量社会调查，很多是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进行的。50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调查方法变得更精细、更严密了。

我们简单介绍了典型组专题讨论方法，希望能引起中国人口学研究者的兴趣，并在运用人口定量数据的同时，重视开发和运用人口的定性资料，根据研究的目的和要求，科学地组织相关专题的定性调查。

（本文责任编辑：朱 犁）